

## 我对新闻史研究的理解

李 良 玉

刚刚开过的讨论会,主题是“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报刊的发达,是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近代新闻史的重要内容。通过新闻史的角度,理解近代报刊和近代社会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口。新闻史、报刊史、出版史,具有很大的相近性。就中国大陆地区的情况来说,报刊是晚清和北洋时代出现的事物,广播电台是1920年代末出现的事物,电视是1950年代出现的事物,互联网是1990年代出现的事物。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些东西,尽管起初都有新鲜事物的性质,通过随后的发展,它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各有不同,但总体上看,是可以包含在新闻媒体的范畴里面的。也许,除了广播电视史之外,将来会有网络新闻史,但在目前,新闻史、报刊史、出版史这三个概念,还能作为新闻出版研究的三个相对稳定的范畴。也可以说,他们分别指代三个互相关联又有区别的领域。

应该注意,对新闻传播的研究,是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要关注的内容。报刊史研究需要涉及报刊的新闻功能,新闻传播是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出版史研究不能遗漏新闻报刊,而这三个领域的研究,必然都要涉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政策。

不可否认,中国近代新闻史与中国近代化有密切的关系。谈到中国近代社会,可以有不同的考量指标,比如,政治的指标,中外关系的指标,经济的指标,等等。所谓政治的指标,多半是看社会制度;所谓中外关系的指标,多半是看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所谓经济的指标,多半是看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技术要素的作用。从经济形态上分析近代社会,经济的指标是一种具有操作性的思路。

单纯透过经济的指标分析近代社会是不够的,必须考虑一定经济水平下的社会分配、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这些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为,这些东西不仅是社会一定经济水平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的强大制约

因素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前提。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两个基本的法则。也就是说,经济技术与政治民主的互动的作用,是近代化研究的基本的视角。

研究新闻史有助于分析中国的近代化。为了说明这一点,应该解释新闻史这个概念。什么是新闻史,好像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要说明这个概念,要从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入手,这就是“新闻”和“新闻界”。

关于“新闻”,可以有两个意义。一是“某种最近发生的事实”,二是“被新闻媒体报道的最近发生的事实”。第一个说法指代生活中天天都会发生的有一定新闻性的但没有被媒体正式报道出来的事情。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无比丰富的,不需要每件事都有报道,但是必定有许多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未被媒体报道。这些事实,都具有新闻的属性。第二个说法指代经过媒体发现和披露的事情,或者说,是记录在各类新闻媒介的文本上的事实,包括那些被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所报道的事实。

由新闻,就有了新闻界的概念。新闻界的概念可以有三个方面的理解。一是新闻行业,二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脉圈子,三是新闻人员的行业作用及其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力。综合以上几种理解的内涵,所谓新闻史,就是对一定时期社会新闻事业及其所记录的社会生活的客观总结。新闻史是社会进步的侧影,从新闻界自身发展的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新闻史就是新闻界的成长史。

应该看到,有媒体报道新闻,有新闻界,是社会发展进化到一定阶段才有的现象。在古代,新闻的传播非常有限,它的主要渠道就是官方文书、书信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口口相传(包括特定时期具有相当覆盖面的社会谣言、流言或其他恐慌性消息)。李白、杜甫诗里所说的“早晚上三巴,预将书报家”;“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描

写的都是那个时代信息不便的情况。到了近代,随着高速度大规模信息需求的产生,随着印刷、纸张、出版、发行等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随着教育发展造就了庞大读者群,新闻的发布和传播,才出现了经过媒体实现的体制化现象。由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政界、军界、学界、工界、农界之外,也才有了新闻界的出现。

由此可见,新闻业的诞生和发展,不仅仅在社会经济技术的层面上与近代化相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打破专制政体,实现社会民主化,自由的信息传播,养成公正舆论,发挥有效的社会监督这些意义上,适应了近代化的需要。近代新闻史和政治史的演变,可以证明这一点。

新闻史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新闻事业的社会价值。简略地说,报道事实真相,提供真实信息,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是新闻事业社会价值之所在。新闻业的职业精神、职业伦理和它的社会正义性,都与这个社会价值相联系。正由于新闻事业的价值,是通过提供真实的新闻,维护公众的知情权,达到使社会了解真相,明辨是非,弘扬正气,实现舆论监督的目的,所以,新闻的进步力量,是一种社会公权力。

之所以强调新闻的进步力量是一种社会公权力,是为了把新闻事业的价值和新闻工具论区别开来。假如我们简单地讲,新闻就是一种社会公权力,那无异等于说,谁掌握了新闻工具,谁就代表这种社会公权力。而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综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那些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军阀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等等,无一不是通过掌握新闻工具,实现他们垄断新闻,捏造事实,欺骗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目的。撇开这一点不谈,即使在一般政治环境下,新闻行业本身也是鱼龙混杂,各种媒体社会背景不一,立场不一,水平不一,是不能离开社会监督和舆论界行业监督的。媒体必须在市场中求生存,无论记者、编辑、新闻企业主,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职业逐利性,或者说,都会在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道德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进行博弈,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谁掌握了新闻发布权,谁就是在正确地行使这种社会公权力。

换句话说,不论什么时候,只有新闻媒体、新闻界、新闻从业人员忠实于新闻事业的使命、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通过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和公

众的知情权,使新闻报道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的时候,才能说,他们正确地运用了这种社会公权力。

与新闻的社会价值和新闻的力量相联系,就发生了新闻史研究中必须注意的两个问题,即新闻业、新闻企业和新闻人应该如何运用新闻权,以及政府应该如何对待新闻监督。

一般说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而政府由于管理社会的需要必然也有管理新闻业的需要。特别对于由君主集权向民主宪政社会过渡的近代中国来说,新闻自由体制的培养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新闻界、民众和行政当局对于建设现代社会的新闻自由体制,同样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在这里,既要分析新闻界、新闻人对新闻使命的忠诚,也要分析新闻界、新闻人的某些逐利行为;既要通过分析新闻叙述精英世界,也要通过分析新闻描述世俗生态;既要肯定那些必要的法制建设和管理措施,也要否定那些对于新闻权的错误压制;既要透过新闻记录社会的进步过程,也要透过新闻分析社会某些落后甚至阴暗的性质。

从学术分类上说,新闻史研究属于一种专史研究。这种专史的研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我认为主要在于弄清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容、过程、规律和经验,为当前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般地说,我们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会面对五种有区别的新闻事业类型。即晚清政权和北洋政权体制下的新闻业,1927~1949年时期国民党政权体制下的新闻业,1931~1945年时期日伪政权体制下的沦陷区新闻业,港澳台特定政治体制下的新闻业,1921年至今的大陆地区中国革命政治体制下的新闻业。原则上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新闻史,应当是对这五种类型新闻史的全面总结。

上述五种类型的新闻史中,价值相对大一些的是三种,即国民党政权体制下的新闻史,中国革命体制下的新闻史,港澳台特定政治体制下的新闻史。

国民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是在1927年,不过,在这之前,它已经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了三十多年。1905年《民报》的创办,既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国民党人从事新闻斗争的重要起点。在国民党人管理国家的22年

里,它建立了一整套官方新闻体系,制定了一大批新闻管理的政策法令,民间新闻企业也有长足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闻事业的规模,达到了在国际上并不落后的程度。

研究民国新闻史,自然不能回避国民党人的新闻政策。这些政策,具有很复杂的性质。既有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内容,也有坚持其一党专政的内容;既有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也有压制民众民主权利的内容;既有允许民间新闻企业经营发展的内容,也有专门打击取缔共产党人革命宣传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来,国民党人在大陆的失败,是它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它的失败的新闻管理政策,只不过是它的失败的社会政策的陪葬品。

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是中国革命政治体制下的新闻事业史的开端。1921年以来,这个类型的新闻事业,以1949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它们的成就和经验都是巨大的丰富的。在1949年之前的阶段,它的最大特点,是新闻与宣传的结合。新闻是宣传的工具,也是革命的工具。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也造成了空前的革命力量,成为引导革命逐步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1949年以后,当代新闻事业不仅曾经长期固守新闻工具论的轨迹,而且曾经长期遭受极左政治路线的束缚。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新闻事业改革发展的艰难过程,当代新闻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新闻事业的水平,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与社会长治久安的要求还很不适应,还需要从各方面继续加以改良。

大致上,1895年以来,台湾地区的新闻业,经过了1895~1945年的日据时代,1949~1970年代的国民党威权时代,1970~1990年代的现代化起步时代,1990年代以来的多党竞争时代,这样四个不同阶段的变化。1945年至今的65年里,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集权的执政者,宪政的建设者,失去政权的在野者,通过民生路线和合法途径谋取权力的竞选者,这样一些复杂的角色转换。伴随这个转换过程的完成,台湾地区获得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是稳定的和平的合法的民主宪政体制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尽管台湾地区新闻事业的现状,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的发展经历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台湾新闻经验的本质,是尊重新闻的监督性,尊重由新闻的进步力量所表达的社会公权力。这种公权力的健康,是依靠社会舆论包括新闻业互相竞争所形成的对媒体的有效监督,以及新闻舆论对执政当局的有效监督来保证的。从根本上说,健康的新闻舆论,不是政府管出来的,而是媒体通过高质量的新闻追求品牌效益实现的,也就是说,是新闻竞争的结果。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新闻界和行政当局同等地处于法律的约束之下。法律既保障新闻界享有新闻自由权,又对新闻自由的边界有确切的界定;既保障行政当局的政务施行权,又确保行政当局始终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既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又保障公民的隐私权;既维护法律框架内的社会稳定,又确保民众的民主权利。

近代新闻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新闻自由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新闻事业的成熟水平,是社会心理建设、道德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新闻行业自身建设的重要条件。

在新闻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如何结合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技术史、社会史的学术方法,形成多维的视角,不断达到新的水平。

一般说来,对报刊文本内容的研究,或者说,报刊文本新闻史的建构,是新闻史、报刊史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运用。

对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解读方式:第一,事实的解读。任何一份报纸杂志,要弄清楚什么时候创办的?主编是谁?编辑有哪些?读者有哪些?发表了哪些文章?有过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等等。第二,文本解读。这是对报刊杂志的文字内容的研究,是根据报刊杂志留下来的那些文章,做不同层面的分析。第三,对有关作者的解读。对作者的解读,是要搞清楚作者的基本经历,弄清楚作者发表某些文章的过程和它的背景。第四,文化生态的解读,或者说社会环境的解读。只有把报刊及其作者放在一定文化生态中,才能弄清楚他周围的环境,对他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这么想。对一份报刊来说,也才能知道它的面貌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这些解读中,文本解读是基础,因为其他解读有的可能做得出来,有的可能做不出来。有些

文章作者是谁可能都搞不清楚,只能就文本解读文本。作为报纸杂志,它的最现实的最终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文本。因此,文本解读是第一位的,是报刊杂志研究的主体。文本解读有其缺陷,如果不能把它和其他解读结合起来,就无法把报刊杂志研究透。标准的解读是把四种解读结合起来的解读。也许还有更多的解读方式,但如果没有条件把四种解读很好地结合起来,文本解读至少可以把报刊杂志的基本内容分析清楚。

新闻传播是新闻史、报刊史研究必须注意的基本线索,但是,也可以拓展研究的空间,使新闻史、报刊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的价值。比如,有一些报纸不仅拥有新闻媒介的价值,还拥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和学术积累,专门从学术史意义上研究它,就是一个需要给予注意的视角。比如,关于新闻史的研究,对特定时期新闻报刊的人才策略、营销策略、公关策略、管理策略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比如,围绕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界和其他文化行业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生态,相关族群的生活、思想方式,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公共空间,也是新闻史、报刊史研究应该加以注意的内容。

对一些著名报刊的研究,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有一些刊物所积累的文化资源,远远超出了运用目前一般报刊史研究方法所能够评价的水平。也就是说,它的极大的新闻含量、知识含量、思想含量,使它成为相对时期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成为特定条件下文化转型的重要时代元素之一,成为该时期社会生活现代性的标志性事物之一。实际上,要在中国近代整体历史背景下,在新文化生长点的崇高地位上,才能够恰当地评估它的价值。

比如《东方杂志》,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这份杂志,是近代中国历时最长、容量

最大、影响最巨,集时事、文化、思想、学术于一体的综合性民营期刊。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它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想空间:第一,它是近代出版史上十分出色的大型民间刊物;第二,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期间知识界学习讨论的公共平台;第三,它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间传播新经济、新文化、新科学知识的公共窗口;第四,它是近代民间资本成功经营文化产业的一个范例。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1904~1948年的45年中,《东方杂志》出版44卷819号,共约发表各类作品20 000余篇,其中文艺类作品1000余篇,包括小说和翻译作品900余篇。仅仅1932~1938年的7年中,在《东方杂志》发表作品的作者就有1344人次。

所以说《东方杂志》是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是说它提供给社会的知识有现代性,在推动近代社会转型方面有影响,在近代以来文化事业发展史上有地位,在经营管理上提供了现代企业经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培养人才的作用,等等。

应该承认,近代新闻史、报刊史、出版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迫切需要转换研究方法,采取个案化的路径,对各种报刊分别做全面的清理。在这里,特别应该鼓励和支持年轻学者进行的创造性工作。我相信,我的学生杨永兴对当代《红旗》杂志的研究,陶海洋对《东方杂志》的研究,皮学军对“文革”前《光明日报》的研究,一定能够做出新的成绩,达到新的水平。

总之,新闻史、报刊史研究任重道远,我们应该加倍努力。

收稿日期 2010—09—20

作者李良玉,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 实证功夫与多重视角

朱从兵

中国近代社会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社会舆论的逐步开放,包括报刊在内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从无到有,在挫折中不断得到发展。近代报刊

为人们研究社会历史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其本身的运作也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因此,透过报刊所能看到的社会历史,不